

亚洲合作的主要路径 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王玉主

东亚论文 第 81 期

ISSN 0219-1415
ISBN 978-981-08-5567-3

版权所有 · 未经同意 · 不得转载

出版日期：2010 年 3 月 26 日

亚洲合作的主要路径及中国战略选择

王玉主*

一、 亚洲区域合作的演进

亚洲在地理上涵盖着广泛的领域，但或许是由于历史及宗教因素，也或许是由于作为石油生产国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与东亚及南亚国家贸易联系其实比较密切的西亚国家一直未被纳入亚洲经济合作的范畴。从亚洲合作的历史看，亚洲合作主要是从次区域开始的：二战时期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目标是整合并统治东亚；冷战时期形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很长时间里都致力于东南亚地区的整合；南亚自身的合作因为进展缓慢而少人问津，但同样进展缓慢的东北亚合作则由于这些国家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备受关注。亚洲区域合作的这种次区域性在 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改变，以东盟为基础的“10+1”、“10+3”合作在连通东南亚与东北亚合作的同时，扩展了东亚合作的地理外延。近年来，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积极采取“东向政策”，通过与东盟加强经济联系参与东亚合作，东亚合作也因此进一步向亚洲合作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亚洲并没有形成涵盖其地理领域的合作安排。

1. 殖民历史、冷战对抗与初期亚洲合作的次区域性

二战之前的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多是被西方强国占领的殖民地，长期的殖民历史形成了他们与宗主国的特殊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彼此之间联系的隔绝。这使得亚洲合作缺少必要的人文和利益基础，因而日本在二战期间从自我利益出发的、以东亚共荣为名义的整合只能被证明是一种纯粹的武力征服，“大东亚共荣圈”概念必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灰飞烟灭。虽然战后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但在冷战时期，美国试图支持日本整合东南亚的努力并没有成功，¹ 倒是东南亚部分国家因为应对共产主义“多米诺”的共同利益要求而形成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但这个组织本身就是要在冷战前沿构筑起一道防御共产主义侵袭的堡垒，因此它在很长时间里都只能是亚洲合作的阻碍力量。只是到了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中期，东盟才开始向中南半岛扩展，逐步把东南亚十国全部纳入其合作

* 王玉主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区域合作室主任。

¹ Hiroyuki Hoshiro, “Co-Prosperity Aga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Japan’s ‘First’ Regionalism in the 1950s”, *Pacific Affairs*, Vol. 82, No.3, Fall 2009.

框架之下。²

2. 金融危机与亚洲合作的展开

正如前面分析的，亚洲合作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都只有次区域层次的东盟。亚太经合组织（APEC）建立后，作为区外整合亚洲的力量，把整个东亚都纳入了合作范围，但它对亚洲区内整合力量表示明确的反对。³ 而当时日本支持亚太合作的一个原因据说是担心推动东亚合作会使人想起“大东亚共荣圈”。⁴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说是亚洲合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一方面，东亚国家当时面临的大规模货币投机迫使他们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 IMF 的资金支持，但 IMF 苛刻的贷款条件使得受援国家“经历了将货币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苦恼”。⁵ 痛定思痛，东亚国家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AMF）倡议，尽管受到美国的反对而失败，但随后各国却在“清迈倡议”下达成货币互换合作。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在危机后也开始反思其长期以来依靠西方市场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转而要求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塑造亚洲市场。东盟国家在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建设的同时，也把注意力转向东北亚。亚洲合作因此在 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以“东盟+”的形式开始了新一轮进程。事实上，“10+3”的合作范围与 1990 年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是相同的，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10+3”当时只是一个松散的论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美国主导的 APEC 的失败以及亚洲经济的崛起，美国并没有像反对“东亚经济集团”那样表现出明确的态度。

3. 经济利益、战略博弈与亚洲合作的跨区域动力

从 2005 年东亚峰会开始，东亚合作出现了将区外国家纳入合作范围的倡议。2006 年，当东亚合作沿着“10+3”路线向自由贸易区推进时，日本提出了以东亚峰会（“10+6”）为基础的紧密经济伙伴协定（CEPEA），并按此框架推动

² 东帝汶独立后，东盟在地理上已不再与东南亚完全重合。

³ 关于这件事，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曾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是要在太平洋上画一条线，将日本同美国分开。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 1992 年 1 月 18 日刊登在《朝日新闻》上贝克对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说的话，本文转引自谷源洋，“东亚区域合作概论与中日战略考虑”，《亚非纵横》2009 年第 1 期第 33 页。

⁴ Camroux David (2007), “Asia...whose Asia? A ‘return to the future’ of a Sino-Indic Asian Community”, *The Pacific Review*, 20: 4, pp.557.

⁵ [日]木下悦二，“脱钩轮的去向——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南洋资料译丛》2009 年第 4 期第 7 页。

东亚的贸易合作、成立了相应的专家组，⁶使东亚合作从亚洲合作向洲际合作发展。这种以亚洲为主向亚太地区延伸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西方国家以亚太经合组织为平台对东亚的整合努力。而最近日本新首相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虽然涵盖范围隐约与“10+6”重叠，但日本方面对于“东亚共同体”开放性的强调，意味着它可能被作为一种泛亚太合作的平台。

从亚洲经济发展的客观看，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向区外延伸以及保持开放性是地区各国外向型经济的要求。例如，亚行研究所所长河合正弘等人运用 CGE 模型所作的研究认为，“10+6”FTA 要比“10+3”FTA 对各成员国及世界经济的贡献更大，因此倾向于在“10+6”框架下推动亚洲合作。⁷还有学者甚至认为亚洲只有向全世界开放才能获得最大福利，并因此否定东亚合作的意义。⁸尽管经济利益是亚洲合作向区外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如果我们结合上世纪 80 年代末兴起的亚太经合组织来分析当前亚洲合作的发展，就会发现亚洲合作的跨区域动力由来已久，只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倡议背后的影响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了。亚太经合组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合作，但包含了几乎所有东亚国家。对于东亚来说，这是冷战后东亚在第二地区主义盛行时期某种被动的合作安排，而对于主导亚太经合组织的美国来说，则是在后冷战时期对东亚的积极整合。美国对于 1990 年马哈蒂尔“东亚经济集团”倡议的扼杀，显示了美国对于任何可能影响其在亚欧大陆影响力的地区联盟的高度敏感。⁹而当前东亚合作向“10+6”的扩展，则还包含着日本与中国竞争亚洲合作主导权的因素。总体来看，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不愿看到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亚洲或者东亚合作。¹⁰因此即使对贸易投资自由化这类的低级制度安排，他们也都十分谨慎地对待。

4. 当前亚洲区域合作的主要路径

经过长期的发展，亚洲合作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关联但又具有明显差异的路径，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东盟合作为平台的“东盟+”机制。

⁶ 日本是在“10+3”经济部长会议决定成立的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专家组完成第一阶段报告之际提出“10+6”合作构想的。相关问题请参考张蕴岭，“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趋势”，《当代亚太》2009 年第 4 期。

⁷ Kawai, Masahiro and Ganeshan Wignaraja, “ASEAN+3 or ASEAN+6: which way forward?”, ADB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77, September 2007.

⁸ 例如，Ponciano. Intal Jr., “Is East Asian Regionalism Still Relevant?”, 第七届东亚大会会议论文，2009 年 12 月 6-8 日，吉隆坡，马来西亚。

⁹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必须控制亚欧大陆，因此可能不得不决定如何对付谋求将美国赶出亚欧大陆的地区联盟。[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45 页。

¹⁰ Takashi Tereda, “The rise of China: the impetus behind Japanese regionalism”, East Asia Forum, July 26, 2009. <http://www.eastasiaforum.org>.

东盟合作：东盟成立于 1967 年。它宣称致力于地区经济合作，但只是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才通过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始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合作。1993 年开始的 AFTA 后来伴随着东盟的扩大涵盖了整个东南亚。2002 年，AFTA 在东盟六个老成员之间宣布建成，此后东盟在 2003 年开始了东盟共同体建设。作为区域组织的东盟由于其地缘约束不可能向亚洲扩展，但东盟对东南亚十国的整合使其成为亚洲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东盟+”机制：即“10+”机制，这是当前亚洲合作最主要的机制，包括 6 个“10+1”（即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澳大利亚、东盟+新西兰以及东盟+印度）、“10+3”（即东盟+中、日、韩）和“10+6”（即 10+3 基础上增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

(1) “10+1”合作：“10+1”开始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最初的三个“10+1”是东盟与东北亚三国分别开展双边合作的平台。直到 2000 年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倡议之前，“10+1”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合作倡议。CAFTA 提出后对日本、韩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安排产生了较大推动作用，进而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10+1”贸易合作。这实质上是将三个“10+1”从单纯的论坛推向了经济合作领域。此后，东盟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分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09 年，印度与东盟自贸协定签署，以东盟为中心的“10+1”合作安排达到 6 个。

虽然一直有通过整合“10+1”推动亚洲合作的设想，例如，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在 2004 年发表的有关东亚合作问题的演讲中就提出，东亚自由贸易区将在东盟自贸区和中、日、韩与东盟的三个自贸区基础上形成。¹¹ 而且“10+3”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第一期报告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提出尽早把东亚自贸区建设纳入“10+3”进程，由三个分散的“10+1”自贸区向东亚自由贸易区过渡，¹² 但通过“10+1”推动亚洲合作的前景目前并不明确，至少亚洲区内的四个“10+1”尚无走向融合的实质性步骤。

(2) “10+3”合作：“10+3”是与“10+1”同时开始的进程，是东亚国家应对 1997-98 年金融危机的合作机制，鉴于危机的性质，危机后“10+3”金融领域的合作最为活跃，各国在“清迈倡议”下达成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安排。此外，“10+3”框架下包含多个部长级议程，涉及外交、经贸、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能源、健康、劳动力、科技以及社会福利等领域。2001 年，“10+3”框架下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建议通过建设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

¹¹ Abdullah Badawi, “Towards an Integrated East Asia Community”, <http://www.aseansec.org/16952.htm>.

¹² 张蕴岭，“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趋势”，第 5 页。

等措施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2004年，“10+3”经济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专家组。以“10+3”为基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是在“10+1”合作走向深化后，东亚试图把分散的自贸区加以联合的努力。由中国牵头进行的EAFTA第一期研究过程中，曾有脱离“10+1”建立一个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的要求，¹³但最后的报告还是提出沿着整合“10+1”路径深化亚洲合作。即便如此，东盟方面也出于自身考虑提出了保留意见。日本更是提出了具有竞争性的“10+6”方案。由韩国牵头的第二阶段研究于2009年完成最终报告。考虑到第一期报告后东亚合作的发展实际，二期报告没有再坚持高标准，而是提出了以现实为基础“分步走的渐进、务实战略”。¹⁴目前，两个研究报告都已提交，其对亚洲合作的推动作用最终取决于领导人的决定。

(3) “10+6”合作：“10+6”是建立在东亚峰会基础上的一个概念。200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了东亚峰会的构想，其设想是“对东亚‘10+3’领导人会议的提升”，¹⁵并为以“10+3”为基础构筑东亚共同体提供基础。但在确定东亚峰会的成员时，日本、新加坡等国的提议最终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构想。¹⁶随着非东亚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加入到东亚峰会，峰会不再被看作是深化东亚合作的举措，而其与“10+3”机制的关系也受到关注。因为成员的变化，倡导东亚峰会的马来西亚改变了观点，认为不能以峰会取代“10+3”。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说：“不能把 ASEAN 与中日韩召开的首脑会议与 2005 年 12 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东亚峰会这两个会议混为一谈”。¹⁷虽然东亚峰会最终的定位是与“10+3”平行，是本地区16个国家的领导人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对话的论坛，¹⁸但日本却以峰会16国为基础提出了亚洲经济合作新框架，即“10+6”。

中日韩合作：对于东北亚三国来说，其经济由于战后东亚“雁行模式”下的资本、技术流动而处于高度相互依赖的状态。例如从表1可以看出，三国之间的贸易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但就是被认为合作潜力巨大的中日韩三国在推动区域合作上一直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东北亚国家、尤其是中日两国的经济规模与影响，东北亚合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亚洲合作的关键。但虽

¹³ 张蕴岭，“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趋势”，第5页。

¹⁴ Desirable and Feasible Option for an East Asia FTA, *A Report by Joint Expert Group on EAFTA Phase II Study*, June 7, 2009.

¹⁵ 任晓，“论东亚峰会及与美国的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第50页。

¹⁶ 尽管如此，首届东亚峰会发表的《吉隆坡宣言》仍然宣称，峰会可以在本地区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¹⁷ 转引自熊伟，《供应链竞争力与经济发展》，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¹⁸ 任晓，“论东亚峰会及与美国的关系”，第49页。

然东亚经济因为市场力量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体化,¹⁹ 而且政策主导的各类合作安排在东亚已经超过 100 个,但中日韩合作——中国态度比较积极——却一直没能取得实质进展。套用欧洲合作经验的学者认为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亚洲合作无法走出困境。中日关系对东北亚合作的这种负面影响被细化为“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与不谅解、不理解与不合作”。²⁰ 而事实上,东北亚合作的约束因素可能远不止此。

表 1：东北亚三国双边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中日	1679	1844	2073	2360	2667.3
中韩	900.7	1119.3	1343.1	1599.0	1860.7
日韩	663.1	710.8	776.8	815.7	889.1

资料来源：UNCOMTRADE 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不管原因如何,东北亚合作的缓慢进展对亚洲合作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就经济规模来说,没有中日韩合作的突破,亚洲合作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可喜的是,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东北亚合作出现了新的发展。为了共同应对危机,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开始脱离东盟框架进行正式的定期会晤,目前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已经召开了两届。此外,日本民主党上台后亚洲政策的调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合作利益的提升都是下一步中日韩合作的有利因素,但目前还无法预测东北亚合作能否取得突破。

除了前述的这些合作机制,亚洲各国通过建立双边自贸区的形式也在推动着亚洲合作。中国自 2001 年开始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后,于 2007 年开始推行自贸区战略,已与新加坡、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签订自贸区,并在同韩国、印度等探讨相关合作。日本、韩国、印度、东盟等也都在积极缔结双边自贸区,尽管这种现象造成了被称为“意大利面条碗”的复杂后果,但它至少说明亚洲各国对于推动区域合作都抱有很积极的态度。

区外整合亚洲的合作机制也仍然在发挥作用,例如,虽然 APEC 目前的影响已经无法与其前十年相比,但美国还是以 APEC 为基础提出了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计划,只不过没有引起亚洲国家的重视。或许是由于对 APEC 框架下多边努力的失望,美国在小布什执政后期开始重新重视以双边合作为基础的跨

¹⁹ Kawai, Masahiro and Ganeshan Wignaraja, “ASEAN+3 or ASEAN+6: which way forward?”, ADB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77, September 2007.

²⁰ 张锡镇,“东亚地区一体化中的中日—东盟三角关系之互动”,《东南亚研究》2003 年第 5 期第 32 页。

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目前其发展还有待观察。此外，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上台后提出了亚太共同体（APC）计划，可以看作是区外整合亚洲的另一种努力。但到目前为止，对于 APC 的反应以批评为主，APC 尚未形成实质影响。²¹

从本节的分析可以看出，亚洲合作由于受特殊的历史及政治环境制约而长期落后于欧洲及北美地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覆盖亚洲、甚至东亚的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并且出现了向跨区域发展的势头。

二、亚洲区域合作路径的比较分析

整合亚洲的力量既有来自区域内部的、也有来自区外的；既有基于经济利益的推动、也有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但总体来讲，冷战结束后亚洲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是当前亚洲区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追求合作的经济利益是推动东亚合作的基础动力之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合作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联系加强后南北问题复活的一种反映，²² 但也正是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印经济的崛起，使得亚洲区域合作备受关注，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谁将主宰亚洲合作”。²³ 当下亚洲合作路径的多元化因此应该被认为是经济利益认同趋向一致基础上，战略利益发挥重要作用的表现。

1. “10+3”与“10+6”背后的利益博弈

分析亚洲合作“10+3”和“10+6”两个模式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它们之间本质上的一些差异，作为我们认识亚洲合作、制定我国亚洲合作战略的基础。

首先，从一个超越亚洲的视角来看，这种模式之争背后是美国的控制与亚洲的抗争。²⁴

²¹ 何包钢，“Rudd’s proposal for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 responses and criticisms”，第七届东亚大会会议论文，2009 年 12 月 6-8 日，吉隆坡，马来西亚。

²² [日]木下悦二，“脱钩轮的去向——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南洋资料译丛》2009 年第 4 期第 3 页。

²³ Camroux David (2007), “Asia...whose Asia? A ‘return to the future’ of a Sino-Indic Asian Community”, *The Pacific Review*, 20: 4, pp.551-575.

²⁴ 代帆、周聿峨，“走向统一的东亚秩序？”（《太平洋学报》2005 年第 12 期）一文最后提出东亚秩序是“东亚还是亚太”这一问题，已经隐约触及到这个方面。

亚洲“10+6”既包括长期“脱亚入欧”的日本、也包括计划“脱欧入亚”的澳大利亚。一个打着东亚合作旗号的区域安排却坚持要把非东亚、甚至非亚洲的国家作为其成员，这是为什么呢？这样安排很显然将对亚洲合作实施“拖亚入欧”。对比“10+3”全部为东亚国家这一特点，我认为这两种模式首先是亚洲与非亚洲之争，而非亚洲的背后其实主要是美国因素。美国在亚洲有着重大现实利益，而“从结构层面上看，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是通过保持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来实现的，而美国的主导地位又是通过特定的地区安排而得以保证的”。²⁵亚洲与非亚洲之争也因此明显显示出美国控制与亚洲抗争的意味，而且历史地看，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博弈。

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像日本、韩国这样的盟友，自二战以来这种安排一直是其东亚战略利益的保障链条。²⁶但随着亚洲经济崛起，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整个地区分工联系的日益密切，亚洲区域合作的要求也开始出现。控制与抗争也就从这一时点上开始了。

冷战结束前后由澳大利亚倡议发起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很快被证明是美国试图从经济上将东亚整合到其主导的合作进程的一种努力，事实上，这个最初宣称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尤其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组织受到东亚国家的广泛欢迎。但由于美国过早显示了其对合作进程的武断领导，使 APEC 对于危机中的亚洲失去吸引力并失去活力。可以说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APEC 经历了失去的十年。

对于在 APEC 之后不久、由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美国当时的态度是绝对不允许。应该看到，这是美国基于冷战刚刚结束时其与东亚悬殊的力量对比以及日美安保同盟给东亚下的一道充满自信和霸气的命令。这反映了美国对东亚合作的一个基本态度，即不接受可能排斥美国的地区安排，隐含的一点在于美国坚持对东亚合作的直接领导。美国的态度同时也消灭了日本的梦想，即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这个论坛，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打基础。²⁷美国人似乎意识到了日本的这些考虑，因此贝克国务卿对马哈蒂尔提议的表态是对日本外相说的，Camroux 的说法是“这确保了日本

²⁵ 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第47页。

²⁶ 有学者认为，二战后到 70 年代，东亚实际上在美国的单方面统治之下，例如，代帆、周聿峨，“走向统一的东亚秩序？”。

²⁷ 刘强，“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基以日本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的视角”（《国际观察》2009 年第 5 期）一文的分析认为，日本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已经开始考虑在经济增长后的国际政治地位问题。

不支持 EAEC”。²⁸ 而对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来说，故事基本类似。说明到那时美国人对于可能挑战其利益的安排仍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实际上，直到 2004 年，美国对东亚合作态度的变化并不大。对于当时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时任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是美国不认为有此必要，而且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贝克的关切一样，鲍威尔强调东亚国家的合作不应损害美国与亚洲朋友良好而牢固的关系。²⁹

回到当前的“10+3”与“10+6”之争，美国的态度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³⁰ 比较明显的一点是美国没有像以往那样简单地否定亚洲合作的努力。因为东亚合作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已经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成为“10+6”成员，³¹ 这样，如果亚洲合作按照“10+6”向前推进，则在一个日、韩、澳为美国盟国，印度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与美立场一致的框架内，中国主导这个合作进程而把美国利益边缘化的可能性很低。而即使“10+6”因为中国因素不能成功，日本对“10+3”的消极态度也会使“10+3”名存实亡。

到这里我们基本可以看出美国对亚洲合作态度的历史及其发展，以及“10+3”和“10+6”背后的亚洲与非亚洲之争。也就是说，美国从进入后冷战时期试图把东亚纳入自己主导的区域合作安排受阻之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包括 9.11 后陷入反恐泥潭等）没再提出新的倡议，但由于考虑了中国因素，仍然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亚洲合作亚太化，防止中国通过主导区域合作“坐大”。³² 这体现了国际关系中一个基本逻辑，即强者对弱者的冷淡叫做疏远，而弱者对强者的疏远则被理解为反抗。而美国的这种潜在影响对亚洲来说是清晰的。当年马哈蒂尔提出东亚核心经济论坛倡议后，印尼学者哈迪曾评论说“这个建议太具有反美倾向”，³³ 显示出东盟内部对于美国影响的重视；而吴心伯 2007 年对东亚合作提出的建议，仍以不引起美国的担心为主，说明即使今天美国的影响依然被认为是亚洲合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³⁴

²⁸ Camroux David (2007), “Asia...whose Asia? A ‘return to the future’ of a Sino-Indic Asian Community”, *The Pacific Review*, 20: 4, pp.557.

²⁹ 转引自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第 49 页

³⁰ 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

³¹ 任晓，“论东亚峰会及与美国的关系”。

³² 这是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实际上美国在 1997 年危机后否定亚洲货币基金，更主要的是担心日本，因为那时的中国还只是崭露头角。

³³ Jörn Dosch, “The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Fu-kuo Liu and Philippe Régnier,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Paradigm Shifting*,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42.

³⁴ 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

其次，从亚洲内部形势看，“10+3”和“10+6”之争又反映了中日对亚洲合作主导权的争夺。

区域一体化对亚洲大国来说一直是寻求某种主导地位的途径。因此，有关国家对亚洲合作的领导权十分敏感。如果说“10+3”和“10+6”之争从一个更广泛的地缘背景来看，反映了霸权结构下美国对亚洲的控制与亚洲的抗争这种关系的历史延续。但是回到亚洲，我们仍能看到中日在合作模式上的分歧，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日本对亚洲合作主导权旁落中国的担心，而“10+6”框架的出台正反映了日本在与中国争夺区域合作主导权问题上的信心不足。

首先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前面的分析似乎说明，美国一直想直接控制亚洲合作。其实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国追求的是保障自己在亚洲的核心利益，美国试图把亚洲合作“亚太化”的动因主要在于担心亚洲合作脱离自己的控制，使美国利益被边缘化。实际上，美日关系的历史说明，美国并不排斥日本主导东亚（亚洲）合作。当然，因为“日本战略文化的复杂性，其既有‘与强者为伍’的理性思维现实，更有‘挑战强权’的非理性冲动传统”，³⁵ 所以有时美国对日本完全脱离其战略考虑的倡议（例如亚洲基金）也会持坚决否定态度。但当前亚洲合作的格局由于中国崛起因素的加入，美国对日本主导亚洲合作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因为一个可以避免中国主导的亚洲合作安排即使不是最好、但也可以接受。

关于中日争夺主导权问题，至少从日本的认知上早已开始。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争当地区事务主导者是日本战略的一部分。³⁶ 日本自经济起飞后的一个目标就是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³⁷ 但中国经济出人意料的崛起咄咄逼人，使日本除了要摆脱美国的控制之外，³⁸ 又多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压力。因此，中国 2001 年与东盟国家几乎可以说是意外达成的自贸区协定，对日本形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时至今日还被日本认为中国占了外交先手。³⁹ 而当前日本提出的“10+6”框架，在中国学者看来清楚显示了“日本主导东亚合作的意图”。

³⁵ 刘强，“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基以日本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的视角”，第 50 页。

³⁶ 刘强，“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基以日本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的视角”，第 47 页。

³⁷ 近年来日本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努力说明了这个问题。

³⁸ 其实日本国内对于美国的控制存在极大的反对声音，参见刘强，“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基以日本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的视角”。

³⁹ 2009 年底，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西口清胜在北京召开的一个中日关系研讨会上，还在谈论当年中国在自贸区上的先手棋问题。

⁴⁰ 而相关的计量研究虽然认为“10+6”的福利效应较“10+3”更大，⁴¹ 但却没有达到让人信服的程度，尤其是考虑到扩大后自贸区实现难度加大的因素之后。

对中国来说，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主导的地区合作安排当然是一个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的优势选择。因为“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不管是从全球战略还是从地区战略出发，都应该建立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一体化战略”。⁴² 实践当中，中国对于“10+3”合作还是表现出较强的倾向性，一则是因为它更符合周边战略的要求，同时在这个表面上由东盟主导的框架内，中国有更大的话语权；二则从效率角度来看，这个框架也使合作安排更容易达成和实现。目前看，韩国和东盟部分国家也倾向于在“10+3”框架下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主要的考虑也还是效率问题。

2009年，中日之争似乎因为日本重提“东亚共同体”而进入一个新阶段。日本民主党上台后，提出了共同体计划。日本选择首先与中国沟通这一倡议，显示出与中国协调推动东亚合作的意图，尽管日本的共同体框架仍然是在东亚峰会之下的“10+6”。但日本选在美国与中国谈这个新倡议，也说明日本需要美国对这个倡议的支持。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美国对日本共同体倡议有什么新评论，估计不会否定。

2. 中日韩合作与东盟的地位

“10+3”和“10+6”两条路径之间的利益博弈，背后主要是大国利益争夺。但亚洲合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小国集团东盟在亚洲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区域一体化理论强调的、以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能力定义的核心国家——中国和日本，由于双边关系的制约，不仅无法通过合作发挥真正的主导作用，而且不得不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

因此，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东盟在推动“10+”机制方面态度积极。在东盟看来，作为小国集团，通过加强内部合作、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可以提升其谈判能力，维护集团内国家的利益。不仅如此，在亚洲合作的特殊力量背景下，发挥主导作用的东盟还在谋求通过“10+”机制构筑一种对自身有利的地区贸易结构。但众所周知的是，一方面东盟国家政治经济规模较小，在“10+3”内东盟的GDP也只占10%多一点，且内部发展水平差距大、发达成员规模很小，无论从市场和资金角度都比较难以成为带动亚洲合作的主导力

⁴⁰ 苏浩，“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与‘10+1’合作”，《亚非纵横》2007年第1期第26页。

⁴¹ Kawai, Masahiro and Ganeshan Wignaraja, “ASEAN+3 or ASEAN+6: which way forward?”, ADB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77, September 2007.

⁴² 曲凤杰，“我国的亚洲区域合作战略”，《国际贸易》2009年第8期第36页。

量。另一方面，尽管自 1993 年东盟就开始推动内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并且从 2003 年开始以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但东盟体内部条件决定的“机制化发展缓慢限制了其地区角色的发挥”。⁴³

或许正因为其主导地位的脆弱性，东盟在自身无法像欧盟那样通过扩展推动亚洲合作的同时，对于任何可能危及“10+”机制的亚洲合作倡议都十分敏感。中日韩合作在东盟看来会使东盟在亚洲合作中被边缘化，因此自 2008 年中日韩领导人第一次会议召开以来，东盟方面对东北亚合作的进展一直十分关注。与此同时，虽然东盟支持以“10+”机制推动亚洲合作，但由于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在处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关系上采取的是“大国平衡战略”，东盟对亚洲合作“10+”框架内大国的力量平衡也很敏感。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韩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10+3”框架内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因此不仅日本、东盟也支持亚洲合作向“10+6”发展，把印度、澳大利亚引入一个扩展了的“10+”框架，以平衡中国的影响，从而维持亚洲合作框架内部的力量平衡，继续实施“大国平衡战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亚洲合作实际影响力比较在意的中国和日本在推动东北亚合作时都还需要强调支持东盟在亚洲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因为任何一方过度强调中日韩合作都会影响其与东盟的关系，进而与各自追求的、在区域合作中提高影响力的目标背道而驰。⁴⁴ 尽管如此，2009 年下半年日本新首相鸠山重提“东亚共同体”时，还是强调了东北亚国家、尤其是中日两国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日本方面对其“东亚共同体”概念还没提出操作性意见，但中国对这一倡议的态度逐步转向积极说明，东北亚合作或许将有新的发展。

三、 中国区域合作利益分析

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借助 APEC 参与区域合作以来，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因为中国的开放虽然面向全球，但长期以来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体制在推动全球经济自由化方面步履维艰，与此同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区域安排的发展又把世界市场人为分割开来，迫使中国不得不在加入 WTO 后仍积极推动区域合作。⁴⁵ 对中国来说，推动亚洲区域合作既是应对当下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要求，也是未来、特别是后危机时期创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⁴³ Camroux David (2007), “Asia...whose Asia? A ‘return to the future’ of a Sino-Indic Asian Community”, *The Pacific Review*, 20: 4, pp.559.

⁴⁴ 例如，前述河合正弘等人的研究就强调要坚持东盟在亚洲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⁴⁵ 张蕴岭，“东亚合作需要创新”，《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1 期，第 30 页。

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要求。但目前事实是亚洲合作虽然目前机制众多，“10+1”、“10+3”、“10+6”、“中日韩”以及各种双边自贸区等等，却尚未形成一个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情况下，中国对于亚洲区域合作路径的选择取决于如何界定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利益。

1. 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分析中国区域合作的一个基本背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例如，中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和进入 21 世纪后 GDP 两次连续五年增长超过 10%，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从发展模式上看，规模巨大的中国到目前为止还在延续东亚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这是分析中国区域合作利益的一个基本背景。

图 1 显示，中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告别短缺经济、对外贸易转变为通过扩大出口拉动需求和带动就业直到 2008 年，对外贸易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速，即使受 1997 年金融危机、2001 年“9.11”事件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仍然保持正增长。这说明在长达 14 年的时间里，外贸出口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一直在为中国经济奇迹发挥着积极作用。但 2008 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却导致中国出口负增长 16%，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2.4%。在经济增长背后，则是对外贸易部门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中国的就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 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制造业产品占 93%，⁴⁶ 而支撑制造业出口的是外贸部门的庞大就业。这或许正是为什么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出口面临压力时，有关部门估计有近 2000 万农民工返乡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脆弱之处。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与对外贸易相关区域合作战略关心将不仅仅是合作的潜在经济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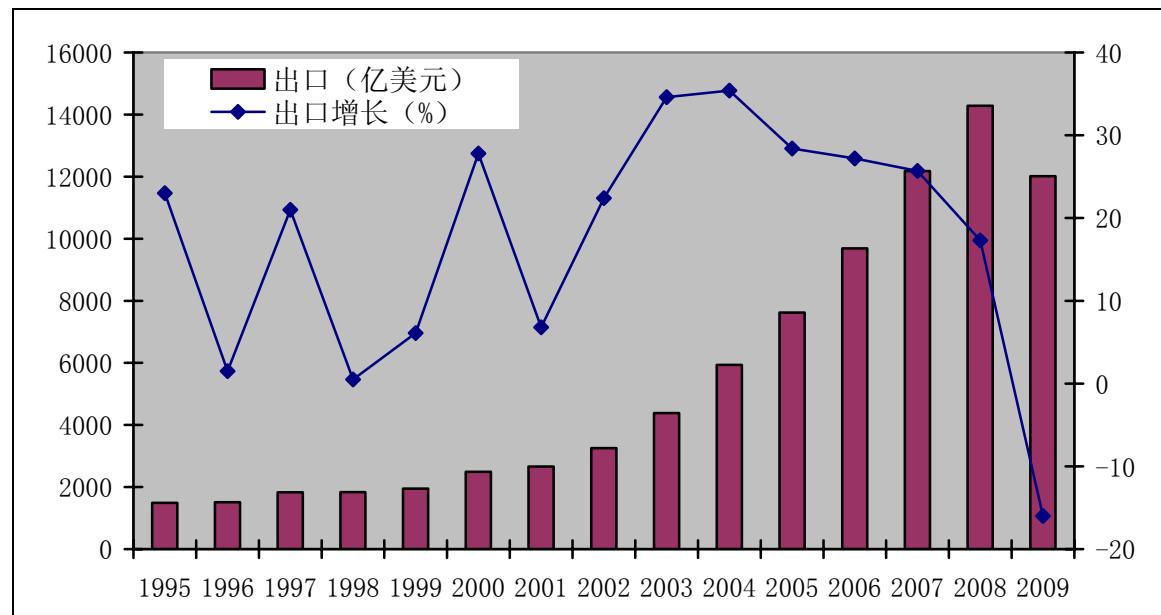
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未来发展，考虑到中国经济规模即将成为全球第二，对外贸易总额“坐二望一”这一事实，一些学者提出中国需要思考外贸的地位与角色，例如应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统筹内外需、减轻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等。⁴⁷ 但从表 2 可以看出，中国不仅要重新思考外贸战略，更需要调整长期依靠外贸、外资的经济发展战略。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了向内需带动增长模式转变的努力，但这一目标不可能马上实现。因为对外贸易的背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流入，并带动中国制造业不断扩张的事实。这种发展的结果是目前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世界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在 10% 左右。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占世界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 30%，鞋类出口占 25%，电子数据处理设备和办公设备、通讯设备占世界同类产品贸易的 22% 和 20%。机电产品出口额占世界第

⁴⁶ 世界银行，《世界经济指标 2008》。

⁴⁷ 李健，“‘坐二望一’须思量——中国外贸地位与角色的变化”，《国际贸易》2010 年第 2 期。

一位的有近 40 种。中国海关统计显示，在 2009 年 12017 亿美元的出口中，机电产品占 7131 亿美元。⁴⁸

图 1：中国出口增长趋势（1995-2009）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ADB,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及《国际贸易》2010 年第 2 期资料。

基于改革开放 30 年里逐步形成的“世界工厂”地位，中国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对外贸的依赖，即需要长期保持较为庞大的制造业部门。即便如此，中国也必须逐步实现贸易平衡，设法消灭巨额的贸易顺差。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区域合作，扩展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

表 2：中国及部分东盟国家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出口占 GDP 的百分比)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印尼	30.5	32.2	34.1	31.0	29.4	29.8
泰国	65.7	70.7	73.6	73.7	73.2	76.4
菲律宾	49.6	50.9	47.6	47.3	42.5	36.9
越南	59.3	65.7	69.4	73.6	76.9	78.2
马来西亚	106.9	115.4	117.5	116.5	110.5	103.6
中国	29.5	34.0	37.4	39.9	39.7	36.5

资料来源：ADB,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转引自[日]西泽利郎，《东盟各国民能否摆脱经济衰退？》，《南洋资料译丛》2009 年第 4 期第 11 页。

⁴⁸ 引自《国际贸易》2010 年第 2 期第 71 页资料“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值”。

2. 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利益

前面分析了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之所以把这种关系界定为分析中国区域合作利益的基础，主要是因为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不仅涉及到中国国内和谐社会建设，也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因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是中国外交实力的基础。从这一点看，中国推动的以贸易、投资为主的区域合作首先通过对对外贸易等部门与中国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了一起。

此外，党的“十六大”把加强区域合作与加强睦邻友好并列写入大会的政治报告之中，说明区域合作还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来看，至少有减少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确立中国在亚洲核心地位等意义。⁴⁹

（1）区域合作与经济利益

一般来说，对于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合作安排，例如亚洲合作中的东盟、“10+1”自贸区、东亚自贸区等，各方的可行性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合作安排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分别衡量合作对各成员的福利正影响及对非成员福利的负面影响；二是合作安排对参与各方GDP的贡献率。在这方面相关的研究文献很多，河合正弘等人对其做过简单的综述：例如，Urata和Kiyota2003年运用CGE模型所作的研究发现，“10+3”自贸区可以给泰国和越南分别带来12.5%和6.6%的GDP增长，但对中国和日本GDP的促进分别只有0.64%和0.16%。Zhang等人2006年的模拟研究证明了类似的结论，即“10+3”自贸区将给东亚各国总体GDP带来1.2%的增长。而Mohanty、Pohit和Roy2004的研究认为，“10+3”加印度自贸区将给成员国带来147亿美元的福利增加。⁵⁰这些研究都支持区域合作安排。

还有很多研究注重不同合作框架的福利效应比较，目的在于探讨推动区域合作过程中合作框架的选择。河合正弘等人的研究就对东盟与中、日、韩的三个“10+1”、“10+3”以及“10+6”自贸区的福利效应进行了比较。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从区域利益来讲，规模越大的自贸区总体福利效应越高，他们因此倾向于建立“10+6”自贸区。

对于中国来说，参与区域合作、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经济利益诉求与当前经济学的分析不完全一致。

⁴⁹ 曲凤杰，“我国的亚洲区域合作战略”，《国际贸易》2009年第8期第35页。

⁵⁰ Kawai, Masahiro and Ganeshan Wignaraja, “ASEAN+3 or ASEAN+6: which way forward?”, ADB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77, September 2007, pp.13-14.

与追求区域合作直接福利效应不同，当前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目标首先在于保证出口市场的稳定。从表 3 可以看出，中国的出口自 1990 年以来逐步转向区外，1990 年到 2008 年，中国出口亚洲的份额从 68.3% 减少到 40.3%，而同期对欧洲和中北美洲出口的份额分别从 14.7% 和 10% 增加到 23.7% 和 22%。而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亚洲其他主要国家除了越南之外，同期都表现了与中国相反的趋势，即出口更多转向亚洲区内，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下降。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以及中国外资 70% 来自周边国家这一事实有关，即周边国家制造业转入中国，但最终产品仍有很大部分出口欧美市场。但这种形式造成了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中非常尴尬的地位。中国已积累 2.4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出口发展面临的是美元本位制以及美国以此为基础的持续经常账户赤字的不可持续性，⁵¹ 而这也是中国依靠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不可持续性。目前，中国正成为危机以来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牺牲品。2008 年 10 月以来，已有 8 个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阿根廷、墨西哥、印尼、俄罗斯、土耳其）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 20 起贸易纠纷调查。⁵² 而对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甚至开始危及到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例如，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出口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挤压了其出口空间。印尼在年初提出延迟执行中国东盟自贸区减税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绪。⁵³

表 3：东亚国家货物出口方向变化（出口市场份额 %）

	亚洲			欧洲			中北美洲		
	1990	2005	2008	1990	2005	2008	1990	2005	2008
中国	68.3	42.9	40.3	14.7	21.7	23.7	10.0	24.5	22.0
日本	26.1	-	43.9	23.0	-	17.1	36.2	-	22.3
韩国	34.0	50.3	51.0	15.5	15.3	15.6	33.4	19.1	16.2
新加坡	47.2	58.0	66.1	17.2	14.0	10.1	23.0	13.5	10.0
印尼	64.4	59.6	63.5	12.8	14.3	12.7	13.8	14.1	10.9
马来西亚	58.0	55.5	60.9	16.6	12.6	11.7	18.1	21.4	15.0
泰国	37.9	54.4	54.7	25.3	14.7	14.9	25.3	17.1	13.2
菲律宾	34.8	61.6	67.9	18.8	14.0	11.4	40.2	17.7	14.4
越南	39.1	40.5	39.8	48.1	22.1	20.6	0.6	23.1	22.0

资料来源：ADB,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1、2006、2009。

⁵¹ 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及中国的参与”，《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1 期 116 页。

⁵² 王申宁，“关于后危机时代外贸政策创新的思考”，《国际贸易》2010 年第 2 期第 10 页。

⁵³ 印尼工业部长 Fahami Idris 说，印尼还没“准备好”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因为印尼产品没法和中国产品竞争。Jakarta Global, August 18, 2009.

2008 年经济危机凸现了中国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而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全球向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更增加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⁵⁴ 但就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看，一下子改变 40% 出口进入欧美市场的局面（2009 年中国主要出口市场情况见表 4）是不可想象的，尽管也有研究对脱钩轮的长期趋势比较乐观。⁵⁵ 2009 年，中国在外贸总体下滑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公共投资实现了“保八”，但在国内消费尚未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的情况下，这种增长政策只能作为非常时期的特殊战略。因此，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动双边自贸区建设以及在亚洲致力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首先就是要在中国短期内无法改变对出口的依赖、而欧美主要出口市场又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拓展新的市场，改变对欧美市场过度依赖的现状，为中国经济向以内需为主的模式转变赢得必要的时间。

表 4：2009 年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

	单位：亿美元；%								
	世界	亚洲	香港	东盟	日本	韩国	欧洲	欧盟	美国
出口额	12017	5686	1662	1063	979	537	2647	2363	2208
份 额	100.0	47.3	13.8	8.8	8.1	4.5	22.0	19.7	18.4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其次，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且人口规模巨大，这决定了中国在过去及未来一个时期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的消耗必将保持较大规模的增长。尽管中国也在努力提高生产技术、淘汰高能耗产业，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许多资源能源产品进口量已经排在世界数一数二的位置。例如，2009 年中国进口的原油和成品油合计超过 1000 亿美元，铁矿砂及其精矿 500 多亿美元，塑料、钢材（及钢铁板材）和铜合计进口超过 900 亿美元。⁵⁶ 从这个角度看，区域合作战略还包含着维护中国基础原材料供应安全的考虑。事实上，中国与东盟、智利签订的自贸区、拟议中的中国—海湾国家自贸区以及当下又重新开始的与澳大利亚的自贸区谈判，这方面的考虑都是比较明显的。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比如在“十二五”期间），通过构筑双边自贸区以及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维持外贸部门发展的相对稳定，同时着力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使经济在向内需转变的过程中，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在此基础上，在一个

⁵⁴ 有关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请参考李向阳，“全球气候变化规则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1 期第 19-28 页。

⁵⁵ [日]木下悦二，“脱钩轮的去向——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南洋资料译丛》2009 年第 4 期第 1-7 页。

⁵⁶ 《国际贸易》2010 年第 2 期第 71 页资料“中国主要进口商品值”。

更长的期间内，充分发挥中国庞大国内市场的优势和制造业优势，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主、或至少中国拥有重要影响的新的亚洲生产网络。在此过程中，积极支持高端产业的进入和低端产业在亚洲区域内的重新配置，使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地位逐步提升。与此同时，在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逐步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

（2）区域合作与中国的战略考虑

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已经分析的，亚洲合作之所以出现各方都需要、却都不愿为了合作的实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的现状，其主要原因在于各方都对合作安排做了战略性考虑。前面提到过，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自战后以来通过贸易和投资带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远远提前于通过政策推动的机制化合作进程。因为对于任何机制化合作来说，首先必须有各方认可的说得清楚的合作收益，然后确定谁将参与游戏、如何制定游戏规则、制定怎样的游戏规则和谁来制定游戏规则等等。由于作为规则的制度是非中性的，谁来主导合作就变得重要起来。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就通过树立美元本位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制以及 IMF “股份制” 把美国的霸权地位植入到战后的国际规则中。美国因此致力于维持当前的国际秩序，并对有可能被其他大国主导的亚洲合作格外关注。

对于中国来说，即使 GDP 规模在 2010 年将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位，但按人均 GDP、财富积累状况、高精尖技术的掌握、综合军事实力等指标来看，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都还只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前面分析的发展目标将一直比较重要。但中国是个大国，其经济增长具有改变国际力量格局的潜力，因此当前国际社会中的既是大国、尤其是作为唯一霸权国的美国会从战略角度认识中国的经济增长。“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全球战略一再调整，但防止欧亚大陆出现能够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发起挑战的大国或大国集团，确保美国在亚欧大陆的主导权始终是美国维护其‘一超独霸’地位的关键所在，始终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所在”。⁵⁷ 基于此，以和平发展为宗旨的中国也不得不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对内通过和谐社会建设凝聚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对外通过推动亚洲合作塑造和谐周边，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通过发挥经济大国应有的影响力，提升中国在亚洲的国际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在经济实力相应提升时向全球大国迈进。这是中国对区域合作战略考虑的一个方面。

分析中国推动区域合作、尤其是亚洲合作战略意义，还必须结合当前的国际力量格局。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当前的国际秩序打

⁵⁷ 贾春阳，“美国全球战略与大西洋联盟”，《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12期第4页。

交道的能力。要想摆脱将来经济发展起来后，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与经济实力严重不相称的局面（这是日本最大的痛处），中国就必须赢得必要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推动亚洲合作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打通周边关系，才有助于中国未来通过经济实力提升在地区的影响，以硬实力为基础来推广和扩大中国的软实力，塑造中国在亚洲受尊重、各国愿追随的领导地位。

总体来讲，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经济利益和战略考虑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目标，对于经济发展处于绝对首要地位的中国，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通过有效的区域合作战略，创造相对稳定的增长环境，中国才可以逐步实现发展的转变，并利用中国的自身优势塑造亚洲区域内新型的国际分工网络，进而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区域合作，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逐步向深入发展，更有利于中国影响力的发挥。此外，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合作、尤其是参与区域合作规则的制定，本身就是发挥影响力的过程。

四、 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战略选择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利益诉求，简单说就是：短期内，以应对金融危机、保证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发展为主，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为我国经济向内需主导转变创造条件；中长期内，努力实现对外贸易平衡增长，并利用中国的市场及制造业优势，在亚洲形成有利于中国的新型生产网络。战略层面上，推动区域合作则是追求在亚洲的有效主导，为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奠定基础。但前面第一、二两部分已经分析了，亚洲合作存在多种路径，且不同路径背后的力量博弈十分复杂。为了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必须针对亚洲区域合作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合作战略。

1. 双边安排与多边框架

目前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中采取的多种策略同时推进的原则。在多边层面上，中国除了参与亚太经济组织的有关活动外，目前致力于亚洲区域合作，主要是“10+3”框架下的合作，近期也开始参与“10+6”合作的相关活动。在双边层面上，中国通过双边自贸区的形式已经与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自由贸易区战略正在稳步推进（详见表5）。

表 5：中国的双边自贸区建设情况

已经签订的自贸区	签署日期	合作方
CEPA	2005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国—东盟	2002.11.4	东盟十国
中国—巴基斯坦	2006.11.24	巴基斯坦
中国—智利	2005.11.18	智利
中国—新西兰	2008.4.7	新西兰
中国—新加坡	2008.10.23	新加坡
中国—秘鲁	2009.4.28	秘鲁
亚太贸易协定	2005.11.2	孟加拉、印度、老挝、韩国和斯里兰卡
正在谈判的自贸区	谈判进展	
中国—海合会(GCC)	2004 年 7 月启动，已谈 4 轮	GCC 成员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 6 国
中国—澳大利亚	2005 年 4 月启动，目前已开启第 14 轮谈判	澳大利亚
中国—冰岛	2008 年 4 月第一轮谈判，已谈 4 轮	冰岛
中国—挪威	2008 年 9 月第一轮谈判，已谈 6 轮	挪威
中国—南部非洲联盟(SACU)	2004 年 6 月开启谈判	SACU 成员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莱索托和斯威士兰 5 国
中国—哥斯达黎加	2009 年 1 月开启谈判，2010 年 2 月谈判完成	哥斯达黎加
正在研究的自贸区	研究进展	
中国—印度	2005 年开始可行性研究	印度
中国—韩国	2006 年开始可行性研究	韩国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相关信息整理。

到目前为止，“10+3”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区根据经济部长会议的指示，已经完成了东亚自由贸易区第二阶段可行性研究报告。虽然已经改变了第一阶段报告坚持建立高标准自贸区的建议，代之以“分步走的渐进的现实、务实的做法”，⁵⁸ 但如果日本没有积极参与，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10+6”框架由于东亚峰会的开放性尚不能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目前美国已经与东盟签订了

⁵⁸ Joint Expert Group on EAFTA Phase II Study, *Desirable and Feasible Option for an East Asia FTA*, June 7, 2009.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加入东亚峰会的障碍已经扫除。⁵⁹ 如果美国加入峰会，以峰会为背景的“10+6”框架如何发展，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框架如何明确都将面临一系列问题。而中国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东亚合作的政治框架可能还是多重框架，难以走向一个统一的框架”。⁶⁰

与多边合作不同，中国通过自贸区战略开展的双边合作不像多边合作面临那么多的不确定性。从表5可以看出，虽然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贸区谈判由于涉及一些敏感问题而一拖再拖，中国与很多国家的合作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但必须看清楚的是，双边合作尽管容易推进，但却无法替代多边合作对中国战略利益的作用。当前中国在全球层面上面临再平衡压力，而这种压力从国内经济角度来看则是中国经济向内需主导转变的压力，这是一个需要一定的时间逐步完成的任务。在当前亚洲多边合作前景尚不明确，中国经济又不能迅速摆脱依赖出口这一局面的情况下，已经启动并运行良好的双边自贸区战略应该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期发挥主导作用。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转向内需主导，开始利用市场和制造业优势重塑亚洲生产网络时，则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多边合作就必须取得突破。否则，在一个被多个贸易安排分割的市场上，资源无法进行有效地再配置。而要树立中国在亚洲（至少是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实现亚洲区域一体化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实际上，就亚洲合作面临的复杂利益博弈以及不确定前景这一点来说，推动亚洲合作迈向实质性步骤相当困难。而中国正视并突破这些困难推进亚洲合作的过程，就是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积累的过程。因此，选择一个于我有利的合作框架（比如“10+3”）推动亚洲合作，是实现中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有效途径。

对中国来说，双边与多边的关系是：坚持双边自贸区战略，为中国经济向内需转型创造条件（其实也是为中国营造和谐的国际关系），同时积极推动亚洲合作，实现在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的情况下，逐步树立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2. “10+3”、“10+6”与中日韩合作

推动亚洲合作的主要路径目前有两条，即“10+3”和“10+6”。但从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这两条路径背后的博弈却是多方参与的：美国希望维护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密切注视着崛起的中国，对任何被其认为可能危及其利益的合作安排高度敏感。日本虽然有通过推动亚洲合作回归亚洲，并逐步脱离美国的

⁵⁹ 按照东盟的要求，加入东亚峰会要符合三个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⁶⁰ 张蕴岭，“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趋势”，第8页。

控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要求（这一点在去年民主党上台后有一些表现），但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又使其对推动多年的“10+3”框架不再自信，“10+6”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产物。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因为东亚特殊的政治环境而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它十分担心失去这个核心地位。又因为东盟在亚洲一直是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处理与各大国的关系，所以对于保持合作框架内主要大国的力量平衡有着本能的倾向，支持“10+6”显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尽管“10+6”框架下的亚洲合作可能不容易实现。处在中日之间的韩国一直以来对推动亚洲合作持十分积极的态度。虽然它寻求在中日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但无法对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发挥决定性作用。近年来，面对亚洲区域合作停滞不前的局面，韩国也开始寻求通过双边自贸安排加强与区外主要市场的联系（已经与欧盟和美国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

中国利益要求支持亚洲区域合作的深化，因为中国最具有主导亚洲的实力。而从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角度来说，“10+3”是一个更有利的合作框架。理由很明显，正如日美等国担心的，中国在“10+3”框架内可能具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对合作进程的主导意味着在倡议的发起、游戏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地位。如果是在全球层面，这是大战胜者的特权。⁶¹ 同时，从中国对区域合作的要求来说，也更倾向于实现的“10+3”框架。

比较各方的立场可以看出，尽管中日之间在“10+3”还是“10+6”问题上确有竞争，但这两个框架的突破都依赖东北亚合作、即中日韩合作是否能取得实质进展。如果中日不能达成妥协，而无论“10+3”还是“10+6”都只能是论坛，而无法达成合作协议。2006年以来亚洲合作的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东北亚合作是亚洲合作的关键一点。但在这个问题，有一点对中国比较重要，由于中国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在于中国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需要明确坚持“10+”，维护通过多年努力取得的与东盟的良好关系。因为中国目前坚持“10+3”框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与东盟的良好关系，但中国东盟关系是中国充分尊重东盟利益、通过积极的合作战略塑造的结果。

中国应继续坚持在“10+3”框架下推动亚洲合作，但鉴于中日韩合作对亚洲合作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应致力于中日韩合作的突破。

⁶¹ Ikenberry, John,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